



THE HUMAN
CONDITION
人的境况



Thomas Arentz

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 译



THE HUMAN
CONDITION

人的境况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 译
Hannah Arend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境况/(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著;王寅丽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书名原文:The Human Condition

ISBN 978-7-208-14318-0

I. ①人… II. ①汉… ②王… III. ①经济活动分析
IV. ①F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9241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于力平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人的境况

[美]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75 插页 4 字数 280,000

2017年4月第2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318-0/D·2982

定价 68.00元

前 言

1

1957年，一个人造的、在地球上诞生的物体，被发射到了太空中，在随后的数星期内，它绕地球航行，与不停地做旋转运动的天体——太阳、月亮和星辰——一样，遵循着同一套重力规律。准确地说，这个人造卫星既不是月亮或星星，也不是沿圆周轨道运行的天体，后者对我们受地球寿命所限的凡人来说，是永恒存在下去的东西。不过，在一段时间里，这个人造卫星打算留在太空中，它以与天体近似的方式在天上栖息和运行，仿佛它已被暂时地允许加入它们的高贵行列。

这一在重要性上无可比拟，甚至比原子裂变还重要的事件，如果不考虑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带来的令人不快的影响，就应当得到人们无比喜悦的欢呼。但奇怪的是，人们的欢呼并非胜利的喜悦，也不是在面对人力掌控自然的巨大力量时，充盈于心中的骄傲和敬畏之情（现在当他们从地球上仰望天空时，就能观看到一个他们自己制造的东西）。在事件发生的一瞬间，直接的反应是大松一口气，人类总算“朝着摆脱地球对人的束缚迈出了第一步”。这个奇特的宣言不是某个美国记者随口说说的，而是恰好重复了二十年前刻在一位俄国伟大科学家墓碑上的惊人之语：“人类不会永远束缚在地球上。”

这样的情绪一段时间来很常见，表现为人们已处处不愿再慢慢吞吞地理解和适应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而且，他们在几十年里就把科学甩到了后头。在这儿和在其他方面一样，科学家们实现了人们最大胆的梦想，证明这些梦想既不狂野也非荒诞无稽。新奇的只是这个国家中最受人尊敬的一份报纸，终于把直到那时还尘封在不太受人尊敬的科幻文学里的故事（不幸的是，对科幻故事作为一种大众情绪和大众愿望的传达手段，没有人给予应有的重视）登上了报纸头条。这个报道的平庸不应当让我们忽视它事实上的了不起，因为尽管基督徒说过尘世是一个泪之

2

谷，哲学家把他们的身体视为思想或灵魂的监狱，但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人把地球本身看作人类身体的监狱，或表现出如此急切地想从地球上移居到月球上的渴望。难道肇始于一种背离（不必然是背离上帝，而是背离作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的一位神）的现代解放和世俗化，要终结于更致命的对地球本身——天空下所有生物之母——的背弃吗？

地球是人类条件的集中体现，而且我们都知道，地球自然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能为人类提供一个栖息地的场所，在这里人类不借助人造物的帮助，就能毫不费力地行走和呼吸。世界上的人造物把人类存在与一切纯粹的动物环境区分开来，但是生命本身是外在于这个人造世界的。而现在大量的科学投入却致力于让生命也成为“人工的”，切断这一让人属于自然母亲怀抱的最后纽带。同样一种摆脱地球束缚的强烈渴望，也体现在从试管中创造出生命的努力，体现在“从能力显著的人身上取出精子冷冻”，混合后“放在显微镜下制造出超人”，并“改变（他们的）体形和能力”的愿望中。而且我猜想，摆脱人类条件的心愿，也体现在让人的寿命延长到百岁以上期望中。

3 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可以生产出的未来人类，似乎拥有一种反抗人类被给定的存在的能力，拥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就世俗而言）的自由天分，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给自己换上他造出来的任何东西。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实现这种自由交换的能力，正如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当今有能力破坏地球上的所有有机生命。问题仅仅在于，是否我们真的想在这一方向上使用我们的新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这个问题不能由科学手段来决定，它是首要的政治问题，从而也不能留给专门科学家和专门政治家来回答。

即使这样的可能性还处在遥远的将来，但科学伟大胜利的首个令人振奋的结果，已经让科学家们感到他们自身处在自然科学的危机当中了。一个棘手的事实就是，现代科学世界观的“真理”，虽然可以用数学公式来演示并在技术上得到证明，但无法再让自身表达为普通的言说或思想。只要这些“真理”一得到连贯的概念表述，接下来的陈述就必

定是“或许不像‘一个三角形的圆’那样无意义，但至少像‘一个长翅膀的狮子’那样无意义”（薛定谔语）。我们还不知道这种状况是不是最终的，但有可能的是，我们——受地球限制却仿佛像宇宙的居民一样行动的生物——大概永远都无法理解，即无法思考和谈论我们仍然能够做的东西。就此而言，我们的大脑（构成了我们思想的物理和物质条件）似乎没有能力理解我们所做的事，以至于从现在起，我们的确需要人造机器来代替我们思考和说话。如果真的证明了知识（在现代意义上是“知道—如何”）与思想已经永远分道扬镳，那么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不仅是我们机器的奴隶，而且是我们的“知道—如何”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纵，哪怕它会置人于死地。

除了这些最终的和尚不确定的后果之外，科学所创造的形势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凡言谈遭遇危险之处，事情就在本质上变成了政治的，因为言谈使人成为一种政治存在。假如我们遵照如此频繁地催促着我们的建议，即让我们的文化态度也去适应当前科学成就的地位，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采取一种让言谈不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因为今天的科学已经被迫采取了一种数学符号“语言”，虽然这种符号语言最初只不过用作口头陈述的一种省略形式，但它现在包含的陈述再也不能转译回口头言说。为什么说不信任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政治判断是明智的，首先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性格”——他们没有拒绝发明核武器，也不是因为他们“天真”——他们不明白这些武器一旦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会就如何使用来咨询他们的意见，而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言谈已经丧失力量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做什么、认识什么或经验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谈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或许存在着超越言谈的真理，或许这些真理对单个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即他可以是任何人，只要他不是一个人政治的存在。但复数的人（就生活和行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而言）能够体验到意义，仅仅因为他们能够互相交谈，能够听懂彼此和让自己也弄明白。

当然更迫在眉睫的和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另一个差不多同样危险的事件：自动化的发明。这个东西在几十年里就使工厂变得空空荡荡，把人类从它最古老最自然的重负——劳动负担和必需性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这儿，人类条件的一个根本方面也处于危险之中，不过对这种条件的反抗，以及把人从劳动的“辛苦操劳”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并不是现代特有的，而是和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摆脱劳动的自由不是一种新的自由，它曾经属于少数人最牢固的特权。就此而言，似乎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只不过被利用来达到从前所有时代都梦想过，但没有人能够实现的东西。

5 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现代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的赞美，并导致整个社会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从而这个愿望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愿望一样，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就自我挫败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个社会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因为人们以劳动的方式共同生活，在这里没有阶级留下来，没有一种带有政治或精神性的贵族留下来，让人的其他能力可以得到保存和更新。甚至总统、国王和总理都把他们的职位看成社会生活必需的一项工作。在知识分子当中，只有孤独的个人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当成一项创作，而非一项谋生活动。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劳动是留给他们的唯一活动。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

对于这些当务之急和困境，本书不打算提供一个答案。这样的答案每天都在给出着，而且它们是实践政治的事情，服从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也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仿佛我们这里处理的问题能一劳永逸地给出解答似的。我下面打算做的，是从我们最崭新的经验和我们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考虑人的条件。显然，这是一个思想的问题，而无思想——不顾一切地莽撞或无助地困惑或一遍遍重复已变得琐屑和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因此，我打

算做的非常简单，仅仅是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

“我们正在做什么”确实是本书的中心主题。它只处理人类条件的最基本区分，讨论那些传统上，以及按照通行意见，都在每个人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活动。由于此点和其他原因，人之所能的最高级，或许也是最纯粹的活动——思考活动，就不在当前的考虑范围内。从而本书限于系统地讨论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者构成了本书的主要三章。就历史而言，我在最后一章处理现代，对我们从西方历史上所知的、诸活动等

6

级序列的多种概貌的讨论，也贯穿在全书当中。

不过，现代和现代世界还不是一回事。从科学上讲，肇始于17世纪的现代，已于20世纪初终结；从政治上讲，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随着第一次原子爆炸而来临。这里我不讨论作为本书写作背景的现代世界。一方面，我把自己局限于对那些一般人类能力的分析上，这些人类能力出自人的条件，因而是永恒的，即只要人类条件本身不改变，它们就不会无可挽回地丧失。另一方面，历史分析的目的是追溯现代的世界异化——人逃离地球进入宇宙和逃离世界返回自我的双重过程——的根源，以达到对这样一个社会之本性的理解：这个社会从它被一个崭新、未知的时代的来临所征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发展和表现自身了。

目录

导言 玛格丽特·加诺芬 / 1

前言 / 1

第一章 人的条件 / 1

1. 积极生活与人的条件 / 1

2. 积极生活的术语 / 5

3. 永恒对不朽 / 9

第二章 公共和私人领域 / 14

4. 人：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 / 14

5. 城邦与家庭 / 18

6. 社会的兴起 / 24

7. 公共领域：共同 / 32

8. 私人领域：财产 / 39

9. 社会的和私人的 / 44

10. 人类活动的定位 / 48

第三章 劳动 / 60

11. “我们身体的劳动和我们双手的工作” / 60

12. 世界的物性 / 68

13. 劳动和生命 / 70

14. 劳动与繁殖 / 73

15. 财产的私人性和财富 / 79

16. 工作器具与劳动分工 / 84

17. 一个消费者社会 / 91

第四章 工作 / 105

- 18. 世界的持存 / 105
- 19. 物化 / 107
- 20. 工具性和劳动动物 / 111
- 21. 工具性和技艺人 / 117
- 22. 交换市场 / 121
- 23. 世界的恒久性及艺术品 / 127

第五章 行动 / 137

- 24. 行动者在言行中的彰显 / 138
- 25. 关系网和被实现的故事 / 142
- 26. 人类事务的脆弱性 / 147
- 27. 希腊的解救之道 / 151
- 28. 权力与显现空间 / 156
- 29. 技艺人与显现空间 / 163
- 30. 劳工运动 / 166
- 31. 制造对行动的传统替代 / 171
- 32. 行动的过程性质 / 179
- 33. 不可逆性和宽恕的力量 / 183
- 34. 不可预见性和承诺的权力 / 189

第六章 积极生活与现代 / 198

- 35. 世界异化 / 198
- 36. 阿基米德点的发现 / 205
- 37. 普遍科学对自然科学 / 213
- 38. 笛卡尔式怀疑的兴起 / 217
- 39. 内省和共同感的丧失 / 221
- 40. 思想和现代世界观 / 225
- 41. 沉思与行动的倒转 / 228

目录

42. 积极生活内的倒转和技艺人的胜利 / 232

43. 技艺人的失败和幸福原则 / 240

44. 生命作为至善 / 246

45. 劳动动物的胜利 / 251

致谢 / 263

索引 / 265

重订后记 / 303

人的条件

1. 积极生活与人的条件

我打算用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术语,来指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这三种活动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条件(the basic condition)。

劳动是与人体的生命过程对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条件是生命本身。

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种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内,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种的生命循环来补偿。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每个个体的居所,但它本身却注定要超越他们所有的人而长存。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worldliness)。

行动,是唯一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与之对应的是复数性(plurality)的人之条件,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

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的事实。尽管人类条件的所有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相关，但复数性却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条件——不仅是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而且是充分条件(*conditio per quam*)。因此在罗马人(也许是我们已知的最富政治性的民族)的语言中，“活着”等于说“在人们中间”(*inter homines esse*)，“死去”等于说“不再在人们中间”(*inter homines esse desinere*)。行动的复数性条件甚至最早包含在《创世纪》中(“他创造了他们男人和女人”)，假如我们理解这一关于人的被造的故事根本上不同于另一个故事版本的话。[在那个版本里，上帝最初创造了“一人”(亚当)，即创造了“他”而非“他们”，以至于人类众生只是繁衍的结果。]^[1]假如人仅仅是同一个模子无休止重复和复制的结果，其本性或本质就像任何其他东西的本性或本质一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和可预见的，则行动就是一场不必要的奢侈，一次对普遍行为规律的任意干预。复数性是人类行动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或将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

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况密切相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natality*)和有死性(*mortality*)。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人造物品，为有死者(*mortals*)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而行动，就它致力于政治体(*political body*)的创建和维护而言，为记忆，即为历史创造了条件。劳动、工作以及行动，就它们都承担着为作为陌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源源不绝的新来者，提供和保存世界并为之谋划的责任而言，它们三者都根植于诞生性。不过在这三者当中，行动与人的诞生性条件联系最为紧密；我们能在世界上感受到诞生所内含的新的开端，仅仅因为新来者具有开创新事的能力，也就是行动的能力。在此创新的意义上，行动的要素(从而也是诞生性的要素)内含在所有人类活动之中。而且，既然行动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那么诞生性而非有死性，就是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有死性乃形而

上学思想的核心范畴)。

人的条件包括的不仅是生命被给予人的那些条件。人也是被条件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 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 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条件。积极生活置身于其中的世界, 是由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物组成的, 但是这些完全由于人方得以存在的物, 常常反过来限制了它们的人类创造者。除了人在地球上的生活被给定的那些条件外, 人也常常部分地在它们之外, 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人为的条件; 尽管后者来源于人, 因而是可变的, 但也跟自然物同样具有了制约人的力量。因而, 任何接触到或进入人类生活稳定关系中的东西, 都立刻有了一种作为人类存在条件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人类做什么, 他们都总是受制约的存在者的原因。任何自行进入人类世界或被人为拉进人类世界的东西, 都变成了人类条件的组成部分。世界现实对人类存在的影响, 被感知和接受为一种限制人的力量。世界的客观性——它的对象性或物性——与人类条件互为补充; 因为人类存在是被条件制约的存在, 人类就不可能没有物而存在, 而如果物不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条件, 它们就只是一堆不相干的物品的堆积, 一个非—世界(non-world)。

要避免误解: 人的条件不等于人的本性, 与人的条件相应的所有人类活动和能力的总和, 都不构成任何类似于人的本性的东西。10 无论是我们本书中讨论到的人类活动和能力, 还是像思想和理性那样略去不论的活动或能力, 甚至对活动和能力最详尽无遗的列举, 都不构成所谓人存在的本质属性(意即没有它们, 存在就不再是人的存在)。在人的条件中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极端的改变, 莫过于人从地球移居到另一个星球上。这一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意味着人将不得不生活在人造的条件之下, 完全不同于地球给予的那些条件。的确, 到那时, 劳动、工作和行动, 以及我们所知的思想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然而, 即使那些我们想象的离开地球的漫游者, 也仍然是人; 我们关于他们的“本性”所能做的唯一声明是: 他们依然是受条件规定的存在者, 即使现在他们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自己造的。

人之本性的问题，奥古斯丁所谓的“我对我自己成了一个问题”（*quaestio nihi factus sum*），似乎在个体心理学和一般哲学的意义上都是无法回答的。我们能认识、确定和定义我们周围万物的自然本性，但是我们无法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就像无法跳出自己的影子一样。另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有理由假定，人像其他事物一样，有一种本性或本质。换言之，如果我们确有一种本性或本质，那么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或定义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说出一个人是“什么”（*what*）一样说出这个人是“谁”（*who*）。^[2]此处的困难在于，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包括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也限于我们作为有机生命发展最高阶段的样本。但是当我们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时，人的认知模式就不起作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企图定义人的本性的各种尝试，都不可避免地终结于构造出某个神，哲学家的神的原因（自柏拉图以来，这个神已经被思辨为某种关于人的柏拉图式理念）。当然，神圣者的哲学概念被揭露为不过是人的能力和性质的概念化产物，并不是一个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证明或辩护；但是定义人的本性的尝试很容易导致我们产生某种“超人”的观念，并把它等同于神，这一事实足以让人对“人之本性”的概念投去怀疑的目光。

另一方面，人存在的那些条件——生命本身，诞生性和有死性，世界性，复数性以及地球——从来不能“解释”我们是什么或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这些条件从未绝对地限制我们。一直以来，哲学对此的意见不同于那些同样也关心人的问题的科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业已在科学上证明了，虽然我们现在，也许将来要一直生活于地球环境中，但我们不仅仅是局限于地球的生物。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胜利，就在于它能从一个真正宇宙的观点来对待地球所限的自然（*earth-bound nature*），也就是说，明确大胆地从地球之外取得一个阿基米德点。

2. 积极生活的术语

积极生活一词承载且过度承载了传统的负担。这个词跟我们的政治思想传统一样悠久(但并不早于它)。而这个远没有把西方人全部的政治经验加以总结和作概念化表述的传统,产生于一种特定的历史聚合: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冲突。这个传统取消了与其直接政治目的无关的许多更为远古的经验,并最终以一种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达到了终结。*vita activa* 本身是中世纪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 *bios politikos*(政治生活)的标准翻译,在奥古斯丁著作中已经出现,在那里作为交谈或实践的生活(*vita negotiosa or actuosa*),仍反映了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3〕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由人可能选择的三种生活方式*,自由,意即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于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关系的束缚。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排除了所有首要目的在于维生的生活方式——不仅包括劳动的生活(劳动是奴隶的生活方式,为了活命,他忍受必然性的强迫和主人的统治),而且包括自由手艺人的制作生活和商人的敛财生活。简言之,任何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了他全部或暂时的生存,丧失了他运动或活动的自由倾向,就都被排除在了自由生活之外。〔4〕而其余三种生活方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关注“美”的事物,即关注既非必要又非纯粹有用之物:在享乐生活中,美是用来消费的;在致力于城邦事务的生活中,卓越产生了美言嘉行;在探索和沉思永恒之事的哲学家生活中,恒久的美既不会因为人们的营役而生成,也不会因为人们的消遣而改变。〔5〕

亚里士多德的用法和后来中世纪对这个词的用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的 *bios politikos* 显然只用于人类事务领域,强调建立和保持

* 三种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分别是后面谈到的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章五。——译者注

人类事务领域的行动、实践(*praxis*)。在他看来劳动和工作都不够有尊严，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生活(*bios*)，一种自主的和真正属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劳动服务于必需的东西，工作生产有用的东西，它们都依赖人类的需要和缺乏。^[6]政治生活能脱离这一论断，要归功于希腊人对城邦生活的理解，城邦对他们意味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出于自由而选择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决非任何一种为了让人们有序地聚合一起所必需的行为模式。虽然不论希腊人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没有忽略这个事实，即人类生活总是需要某种政治组织，对臣民的统治也可以构成一种特定的生活样式，但在他们看来暴君的生活方式不能说是自由的，也跟政治生活没什么关系，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必然性。^[7]

- 14 随着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奥古斯丁也许是最后一个至少知道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的人——积极生活这个词失去了它特定的政治意义，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事的行动。准确地说，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并没有造成工作和劳动在人类活动等级中的上升，乃至于后来上升到与政治生活享有同等尊严的高度。^[8]实际出现的反倒是另一种情况：行动也从尘世生活必需性的层次上考虑，以至于沉思[理论生活(*bios theōrētikos*)此时被译作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9]

- 不过，沉思相对于任何其他活动、包括行动在内的这种巨大优越性，在起源上并不是基督教的。我们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就可以发现这种优越性，在那里，对城邦生活的整个乌托邦重构不仅为哲学家的高超洞见所引导，而且除了使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之外没有其他目的。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阐述也显而易见受到沉思(*theōria*)理想的引导(在他对生活方式的排列中，享乐生活的地位微不足道)。在古人脱离生命必需性的自由和脱离他人强制的自由之外，哲学家们又加上了免于政治活动(*skholē*)^[10]的自由，以致后来基督教宣称的脱离俗
- 15 事，从所有现世活动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正是以后古典时代哲学的非政治化(*apolitia*)思想为起源和先导的。只不过曾经要求于少数人的事